

第四章 合浦水运交通的平稳期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地区的开发有了巨大的发展，特别是江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尤为明显。但从合浦的发展来看，却并非继续两汉时期高度繁荣、迅速发展的态势，而是进入了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当地经济水平的平稳发展阶段。

南方地区的开发有一个基调，即沿着江浙到江西再到湖南次第推进。目前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区域开发的研究，较多集中在扬州区域，整个南方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体现不足。这个阶段与浙东地区、成都平原相比，赣江流域、湘江流域及湘江流域以南的发展相对缓慢，甚至有些区域仍然处于待开发的状态。经过两汉时期的发展，合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对中原王朝的贡献无疑是开创性的。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合浦港在汉唐时期虽然逐步让位于广州港，但仍不失为岭南一大港口都会。南北割据导致魏晋南北朝时期陆上丝绸之路无法很好地为南方政权服务，这成为促进海上丝绸之路快速发展的政治基础。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合浦水运相比两汉时期高速发展有所降温，但也并未迅速衰落，而是转入了较长一段时间的平稳期。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合浦地区的水运交通

何德章在《中国经济通史（第三卷）》中指出，两汉时期湘江流域是江南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次之是赣江流域，三国吴浙东发展最为缓慢。从《汉书·地理志》以及《续汉书·郡国志》所记载的编户情况来看，两汉时期湘江流域人口增长最快的零陵郡，户口数和人口数的增长率分别高达906.46%和605.76%；在赣江流域人口增长最快的豫章郡，户口数和人口数的增长率为502.7%和374.16%；而浙东的会稽郡户口数和人口数的增长率分别只有29.95%和14.56%。从人口密度来看也是如此，扬州区域的人口密度两汉时期从每平方千米5.4人增至6.5人，赣江流域则从每平方千米2.2人增至10.4人，湘江流域则从每平方千米3.4人增至13.4人。两汉时期经济的发展与人口的增长，在南方地区培育出一个颇具规模的地方市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合浦商业并不完全依赖与中原地区之间的交易，而是同时作为区域市场的交通节点在发挥功能。也正是因为有南方腹地做支撑，合浦才能够在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动荡中维持基本的经济地位和商业功能。

从孙吴时期开始，南方政权便积极开展对外贸易活动。据《三国志·吕岱传》记载：“岱既定交州，复进讨九真，斩获以万数。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权嘉其功，进拜镇南将军。”《梁书·海南传序》记载：“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传记。”这虽然是一次官方的遣使进贡活动，但显然进一步打开了这些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活动，

从而促使海上丝绸之路变得更加繁荣。张焯、颜浩在《魏晋南北朝的海上丝绸之路及对外贸易的发展》一文中，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通过派遣使者，组织大规模官方贸易，招徕外国商人以及维护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等措施，促进了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同时广州港兴起，取代合浦、徐闻成为中国主要的对外贸易港，海上丝绸之路也进一步向西延伸。^[2]

廖国一在《南流江变迁与合浦港的兴衰》一文中指出：“在南北朝时，各地割据政权林立，合浦先隶属交州，后改属越州，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战火纷飞，但合浦港在当时不仅能幸免于战事，而且由于地方统治者的重视而得到缓慢发展。”^[3]甚至于中原的士人主动前往此处，依附于当时的交州刺史士燮及其兄弟合浦太守士壹。当时北方的名儒袁徽更称赞“交趾士府君既学问优博，又达于从政，处大乱之中，保全一郡，二十余年疆场无事，民不失业，羁旅之徒，皆蒙其庆”^[4]。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合浦的水运交通情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方面，南方政权多建都建康，扬州地区因政治因素以及大量北方人口的迁入而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另一方面，因南北分裂，湘漓水道废弃，建康与岭南及南海的交通可以通过海道和赣江进行，最活跃的交通线路变为从广州出发。^[5]在南方开发的背景下，合浦作为两汉时期岭南贸易中心的地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发生变化。这一时期，合浦的建置沿革也多变，较为重要的便是广州的设置，分合浦以北入广州，而合浦以南为交州，后又在广州和交州的交界处即合浦地区设置越州。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地区商业中心由合浦转至广州。

魏晋南北朝时期，合浦向北的水运交通线路较少被提及，而其东西向“东连广信，西控交趾”的交通线路却多见于史籍。同时，从合浦析置县的范围看，合浦的海岸线较两汉时期变化不大，很可能依然是今合浦县西南方向不远。另外，由于广州的发展，航海技术以及造船技术的不断提升，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中心港从两汉时期的合浦逐渐转向广州，合浦的对外贸易不免受到影响。

1. 频繁政区变动对合浦港口经济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不稳，合浦郡治所多变，经济上相当依靠政区附郭优势的合浦港，发展速度直接受到影响。《晋书·地理志下》载：

吴黄武五年，割南海、苍梧、郁林三郡立广州，交趾、日南、九真、合浦四郡为交州。戴良为刺史，值乱不得入，吕岱击平之，复还并交部。赤乌五年，复置珠崖郡。永安七年，复以前三郡立广州。及孙皓，又立新昌、武平、九德三郡。蜀以李恢为建宁太守，遥领交州刺史。晋平蜀，以蜀建宁太守霍弋遥领交州，得以便宜选用长吏。平吴后，省珠崖入合浦。交州统郡七，县五十三，户二万五千六百。合

浦郡：汉置。统县六，户二千。合浦、南平、荡昌、徐闻、毒质、珠官。^[6]

可见这一期间合浦及周边地区的政区变动相当频繁。三国时期，合浦属于孙吴的领地。吴黄武五年（226年），孙吴将原来的交州分为交广二州，割去原交州南海、苍梧、郁林三郡立广州，合浦依然归属于交州，但分合浦以北归广州管辖。吴黄武七年（228年），合浦郡改称珠官郡^[7]。吴太平二年（257年），复称合浦郡。吴黄武五年（226年）以合浦以北分为交广二州，背后有其深刻原因。时值交趾太守士燮统领交州数十年，影响巨大，士燮死后，其子士徽拒绝命其为九真太守的任命，举兵反抗，这即是记载中所述“戴良为交州刺史，值乱不得入”的原因。吕岱上表分交州之地，显然有分化七郡的目的，当中以合浦为界，更是体现了合浦作为军事基地的重要性。在平定叛乱后又将广州归于交部，则说明此时广州还未有很好的发展，交广二州最初的分立，军事目的是最根本的原因，直到永安七年（264年）才复立广州。另外，蜀以建宁太守李恢遥领交州刺史，晋平蜀之后，仍以建宁太守霍弋遥领交州刺史。遥领是不入版图之地，而别于国内他处设刺史、郡守以辖之。^[8]这样的遥领并没有实际占领，但是蜀

国即已设置交州刺史，同时在晋平定蜀地后仍设此职，展现出了蜀地进攻交趾是有一定交通优势的。《三国志·刘巴传》便有记载刘巴先南渡“远适交趾”，后又“与交趾太守计议不合，乃去”，注引《零陵先贤传》称其“乃由牂牁道去”，结果为益州太守所拘留^[9]，这段记载也反映了此时蜀地与交趾道路是畅通可行的，而牂牁道则是经合浦，北上过西江后到达蜀地。由此可见合浦此时之于整个岭南地区的重要性。

经历过三国的动荡之后，到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撤珠崖郡并入合浦郡，同年划出合浦县东北部设荡昌县。建武元年（317年）后，又析合浦县地置新安县。合浦郡依然隶属交州。刘宋永初元年（420年）起，合浦郡属交州。元嘉九年（432年）至大明八年（464年），划出合浦县东北部置临漳郡，合浦郡属广州。泰始七年（471年），划出广州临漳郡和交州的合浦、宋寿二郡，同时增设百梁、龙苏、安昌、南流、永宁、富昌六郡，统称越州。越州和临漳郡驻地在今广西浦北县泉水镇境内。合浦郡管辖合浦、徐闻、荡昌、朱官、朱卢、晋始、新安六县，郡治在合浦县城。

东晋南朝地方州郡割、置频繁，政区规模大大缩小，合浦的经济在动荡中维持。《宋书·州郡志》载：

合浦太守，汉武帝立，孙权黄武七年，更名珠官，孙亮复旧。先属交州。领县七。户九百三十八。去京都水一万八百。合浦令，汉旧县。^[10]

建元元年（479年），合浦郡治迁徐闻县。合浦郡辖徐闻、合浦、朱卢、新安、晋始、荡昌、朱丰、宁广九县。南朝齐永明六年（488年），划出合浦县东北部置北流郡，属越州。合浦郡驻地由徐闻迁合浦县城。《南齐书·州郡志》载：

越州，镇临漳郡，本合浦北界也。夷僚丛居，隐伏岩障，寇盗不宾，略无编户。宋泰始中，西江督护陈伯绍猎北地，见二青牛惊走入草，使人逐之不得，乃志其处，云“此地当有奇祥”。启立为越州。七年，始置百梁、陇苏、永宁、安昌、富昌、南流六郡，割广、交朱载三郡属。元徽二年，以伯绍为刺史，始立州镇，穿山为城门，威服俚僚。土有瘴气杀人。汉世交州刺史每暑月辄避处高，今交土调和，越瘴独甚。刺史常事戎马，唯以贬伐为务。合浦郡：徐闻、合浦、朱卢、新安、晋始、荡昌、朱丰、宋丰、宋广。^[11]

越州的设置不仅是合浦地区人口向北迁徙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其军事方面的价值。越州本是合浦的北界，治所在今钦州市浦北县。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这里是荒无人烟之地，而且环境恶劣，以致“寇盗不宾”。刘宋泰始年间，西江督护陈伯绍来此地狩猎，“北地”即指当时合浦^[12]的北地，因见二青牛惊走入草，逐之不得，便以为“此地当有奇祥”，当立为越州。以此为缘由所请立越州看起来十分奇怪。实际上，“地有奇祥”只是一个借口。后世地方志对于陈伯绍的事迹有更加详细的记载。在清道光年间的《廉州府志·宦绩志》中讲述此事，前因为“泰始四年，妖人刘思道作逆，进攻广州，杀刺史羊希，岭表大震。东官太守萧惠徽与战，败死。伯绍领西江兵讨思道，诛之”，而后“明帝命为交州刺史经营焉”。直到元徽二年(474年)才始立越州，“以伯绍为刺史，督交越二州军事”^[13]。由此可见，越州的设立实际上和陈伯绍息息相关。而合浦历来西控交趾，东连广信，处于这样的水运交通要道，自然也是地方势力积极争取的对象，陈伯绍对于越州设置的建议并最终“督交越二州军事”，都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合浦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梁天监元年(502年)后，撤销临漳郡及其属县，并归合浦县。越州治所迁合浦县城。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合浦的建置是作为交州的一部分出现的，这与汉代地方政区的发展相关，在行政等级上，郡之上出现了州。岭南地区在东汉末期便已设立交州，合浦郡也自然成为交州的一部分。在这之中，合浦的建置情况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方面是合浦的行政区划的调整，另一方面则是行政区划调整当中整个区域行政区划的变化。邹逸麟在《古代合浦史地杂谈》一文中指出：“三国时期吴国分交州东部南海、郁林、苍梧三郡为广州，治番禺，而合浦则变成与越南北部地区合成一个大政区，与中原的关系疏远，这可能是影响合浦港发展的一个契机。六朝以后，岭南地区经济日益发展，广州地区接受北方移民最多，带来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当地的生产。南朝时海外贸易空前发展，广州港因此而逐渐兴起。”^[14]合浦南北分属交州及广州，也充分体现了合浦在这一时期的战略重要性。^[15]

2. 海上贸易衰落对合浦港口经济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海上贸易的衰落从两个方面对合浦港的经济造成较大影响。其一是航海路线的变化，对外贸易中心港口的转移。三国吴万震所著的《南州异物志》记载：“外域人名船曰舶，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去水二三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16]这较汉代时期的船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通过“随舟大小，或作四帆，前后沓载之”^[17]，改进了张挂风帆的技术，船的航行速度得到不断提升。李富强在《西南便捷出海通道的时空变迁》中还称：“古罗马学者白里内《博物志》一书说到，当时中国和罗马这两个东西方大国都与斯里兰卡直接往来，罗马人通过印度航商用宝盒和红海产的珍珠在斯里兰卡与中国商船交换货物，而汉代中国商人还在科罗曼德和斯里兰卡建立了货栈，与来自埃及的西方船舶交换货物。可见汉代中国商船并未到达罗马。但吴黄武五年（226年），大秦（罗马）商人秦论却来到中国，见到了孙权。说明东吴已与红海西岸的北非地区发展了直接的联系。”^[18]这一时期，由于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提高，在两汉时期从合浦出发沿海岸航行的航线逐步被废弃，转而变为从广州出发，直接开展远洋航行。据《汉书·地理志》中的记载，从徐闻、合浦等地出发到黄支国，大概需要一年时间，所到的国家也还需要“蛮夷贾船转送致之”，往往来回需要数年时间。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时间被大大地缩减了。《洛阳伽蓝记》卷四“永明寺”条云：“从典孙国北行三十日，至扶南国。方五千里，南夷之国，最为强大。民户殷多，出明珠金玉及水精珍异，饶槟榔。从扶南国北行一月，至林邑国。出林邑，入萧衍国（南朝梁）……凡南方诸国，皆因城郭而居，多饶珍丽，民俗淳善，质直好义，亦与西域、大秦、安息、身毒诸国交通往来。或三方四方，浮浪乘风，百日便至。”^[19]原来需要一年左右的行程被缩减到数月。在《法显传》中更明确记载，从耶婆提（爪哇）到广州，在正常情况下只需要50天左右。^[20]合浦港处于南流江的入海口，川流环抱，面向大海，是优良的出海口。但它的海面较为狭窄，从合浦港出海往中原或其他地区，必须南下走200多海里绕过琼州海峡，再北上转广州或福建、浙江一带。由于海面狭窄，且附近港口海面暗礁、沙洲众多，加之环涠洲岛一带海域珊瑚密布，航行不便^[21]，因此从广州港出发，较从合浦港出发更具优势。

其二是南朝对合浦采珠业的管理政策，导致合浦商业贸易的萎缩。在《后汉书·孟尝传》中明确记述了珍珠对合浦贸易的重要性，其直接与合浦“商货流通”密切相关。而晋武帝灭吴之后，陶璜曾上言：“合浦郡土地硗确，无有田农，百姓唯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来，以珠贸米。而吴时珠禁甚严，虑百姓私散好珠，禁绝来去，人以饥困。又所调猥多，限每不充。今请上珠三分输二，次者输一，粗者蠲除。自十月讫二月，非采上珠之时，听商旅往来如旧。”^[22]此即证明，从三国吴时期开始，对合浦的珠禁便已开始，即使到了晋代，这一禁令因陶璜的上疏得到了缓解，但仍然是“上珠三分输二，

次者输一”，充分体现了合浦的采珠业所采集的上好珍珠主要用于上贡，而次品才可得到贸易。邹逸麟在《古代合浦史地杂谈》一文中，认为这是合浦采珠业兴衰转变的重要原因^[23]。在这样的情况下，合浦商业贸易所依赖的本地特产受到了朝廷的控制，同时由于内地战乱频繁，合浦也因多次交州叛乱而成为军事兵家争夺之地，商业发展所依赖的安定的环境也受到了冲击，这些都对合浦的对外贸易产生了比较重大的影响。

（二）南方政权内军事地位稳固的合浦航线

南北朝时期南方各政权的重心都在长江流域，华南地区的战略地位也不断提升。虽然合浦港在商业贸易方面有所削弱，从前因繁盛的贸易而形成的多样化水运交通线路出现一定萎缩，但是其作为军事基地的重要性依然存在，甚至还得到了强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交通依然以水路为主，何德章认为：“长江、淮河、珠江及其支流构成了六朝交通的主干。除当时山东半岛没有直接的水路通向建康外，其他地区基本上都有水程记录，而湘江流域、今云贵川三省、两广地区各州内部虽有陆路路程的记录，但从这些地方抵达建康基本上都以水路为主，所以《宋书·州郡志》根本没有这些地区各州郡至建康的陆程记录。”^[24]

合浦处于岭南内陆水路与海上水路的交汇处，可通过南海沿海岸线或运河前往交趾以及东南亚等地。东汉建初八年（83年），朝廷采纳大司农郑弘的建议，“旧交趾七郡贡献运转，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开通了交趾经由零陵（今广西全州西南）、桂阳（今湖南郴州）到中原的道路，至南朝宋时仍为主要路线。张荣芳、周永卫指出：“事实上，郑弘所奏开的零陵、桂阳峽道在公元83年以后，并未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25]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方政权多偏安东南一隅，并且多建都于建业（今南京），这种利用水路的情况就更为明显，因此《宋书·州郡志》言合浦则是“去京都水一万八百”。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涉及合浦的军事行动较秦汉时期更为明晰。《史记》《汉书》中的记载，涉及合浦的军事行动大多是中原王朝对岭南地区用兵，而在东汉以后，合浦军事地位的重要性则主要体现在对交趾的控制上，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体现得尤为明显，以合浦为军事基地出兵平定交州的军事行动多达六次。^[26]这些行动在史书中有所记载，兹列举如下：

黄武五年（226年），吕岱征交趾，“自广州将兵昼夜驰入，过合浦”^[27]。

宝鼎三年（268年），“遣交州刺史刘俊、前部督修则等入击交趾，为晋将毛晃等所破，皆死，兵散还合浦”^[28]。

建衡元年（269年），“遣监军虞汜、威南将军薛珣、苍梧太守陶璜由荆州，监军李勗、督军徐存从建安海道，皆就合浦击交趾”^[29]。“璜败，退保合浦。”^[30]

泰始七年（271年）春，“吴主孙皓遣大都督薛珣、交州刺史陶璜帅二十万军，兴扶严恶夷合十方伐交趾。（杨）稷遣灵及将军建宁孟岳等御之……得稷等，皆囚之……稷至合浦，发病欧血死”^[31]

义熙七年（411年），“（卢循）循乃袭合浦，克之，进攻交州”^[32]。

梁大同七年（541年），“交州土豪李贲反……遣子雄与高州刺史孙同讨贲……至合浦”^[33]。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政权对交趾争夺激烈，交通道路在军事中更是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合浦在中越交通中的枢纽地位也是通过中原对交趾的战争来确定的。合浦与交趾相邻，更是在古代的中越交通中充当着重要的枢纽。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中原入交趾大多以合浦为中转站。特别是这一时期，中原各政权对交州的争夺战争都是以合浦为据点的。

合浦除“西控交趾”外，对于广州同样具有军事上的特殊意义。《三国志》中便记载：

（天纪）三年夏，郭马反。马本合浦太守修允部曲督。允转桂林太守，疾病，住广州，先遣马将五百兵至郡安抚诸夷。允死，兵当分给，马等累世旧军，不乐离别。皓时又科实广州户口，马与部曲将何典、王族、吴述、殷兴等因此恐动兵民，聚合人众，攻杀广州督虞授。……皓又遣徐陵督陶濬将七千人从西道，命交州牧陶璜部伍所领及合浦、郁林诸郡兵，当与东西军共击马。^[34]

此处即体现了合浦作为广州及交州中间重要军事基地的作用，一方面当交州区域发生动乱时，往往以合浦为军事基地，平定交州；另一方面如广州发生叛乱，也可以合浦之兵攻打广州。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广州的发展，其地位越来越重要。合浦地处交广之间，且北为广州，南为交州。其水路可从南流江到达西江，进而到达广州，也可以从海路，沿海岸而行，到达交州。在军事的影响下，魏晋南北朝时期合浦的水运交通道路发展东西向更为明显，长江流域则因多为南北双方对峙的分割线，通行需经过严格的关卡，合浦在这一时期通往长江流域的南北水运交通道路因此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三）南方大移民进程中合浦航线沿途的城镇发展

三国时期，以合浦南北分出交、广二州，到西晋永安六年（309年）再析合浦郡置合浦北部尉。由此这一地区从汉代的一州三郡变为二州六郡。廖幼华认为，三国时期广西的发展已形成以各个大流域为中心的模式，各郡辖县大多位于一条河流的主流及支流上，而郡治则落在大河交会的交通枢纽位置，形成了一个依河系分散、自成小系统的城镇体系。^[35]合浦在这一时期则是南流江流域的中心城镇，自汉以来便已开始接

受中原地区的流徙人员。

廖国一在其《南流江变迁与合浦港的兴衰》一文中指出：“在南北朝时，各地割据政权林立，合浦先隶属交州，后改属越州，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战火纷飞，但合浦港在当时不仅能幸免于战事，而且由于地方统治者的重视而得到缓慢发展。”^[36]甚至中原的士人主动前往此处，依附于当时的交州刺史士燮及其兄弟合浦太守士壹。当时北方的名儒袁徽更称赞“交阯士府君既学问优博，又达于从政，处大乱之中，保全一郡，二十余年疆场无事，民不失业，羁旅之徒，皆蒙其庆”^[37]。

到了南朝时，分合浦设置越州，并在合浦东北部置北流郡。《南齐书》载：“越州，镇临漳郡，本合浦北界也。夷僚丛居，隐伏岩障，寇盗不宾，略无编户。宋泰始中，西江督护陈伯绍猎北地，见二青牛惊走入草，使人逐之不得，乃志其处，云‘此地当有奇祥’。启立为越州。”这时的越州还是一个较为荒芜的地区，以至于“略无编户”。到了萧梁至萧齐时期，越州辖地开始急速扩大，《南齐书》记载，越州统领的十八郡三十个县中，只有北流、思筑、越中、齐隆以及吴春俚下没有辖县，南流、龙苏、盐田、定川、隆川与封山都只统领一县，郡县辖地完全重叠，这也说明这一区域虽有了建置，但移民依然较少。但越州从出现俚县、有郡无县、郡下仅辖一县，最后变为一郡之下统领多县的四种种形态，清楚显示了越州汉人迁入的情况以及开发由浅入深的几个进程。^[38]

除合浦县以北沿着南流江设置越州等郡县外，南方政权在漓江流域建置始安郡及始安、平乐、荔浦、尚安、永丰五县，在贺江及其支流建置临贺郡及下辖临贺、谢沐、富川、冯乘、建兴及封阳六县，在柳江沿岸则建置桂林郡及其统辖的武安、桂林与潭中三县。这些都表明，汉代以来，合浦通过南流江、北流江通往广州以及北上的水运交通线路的交通功能始终保持，所以才能在水路交通沿线发展出一些重要城镇。

二、隋唐时期合浦地区的水运交通

隋唐时期，国家再次大统一，合浦的水运交通线路重新纳入全国路网干线。而在沿海的水运交通方面，合浦海上丝绸之路与西域陆上丝绸之路一起，支撑唐王朝高度繁荣的世界贸易网，其辐射范围不仅仅是南洋，甚至可以北上到达辽东半岛。

隋初合浦经历了一系列的政区调整，入唐后逐渐稳定下来，合浦城市和港口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中保持着既有规模。《通典》记载：

廉州：

炀帝改为禄州，寻改为合州，又废州置合浦郡。大唐置廉州，或为合浦郡。领县四：合浦、封山、蔡龙、大廉并汉合浦县。

雷州：

秦象郡地。二汉以后并属合浦郡地。梁分置合州；大同末，以合肥为合州，以此为南合州。隋平陈，又为合州。炀帝初州废，以属合浦郡。^[39]

隋开皇九年（589年），将合浦郡并入越州。大业元年（605年），越州改称禄州。大业三年（607年），禄州与合州（今雷州半岛）合并，称合州。同年合州改称合浦郡，隶属扬州，辖十一县，其中，合浦、龙苏、封山三县在今合浦、浦北县境内，郡址在合浦县。

唐武德五年^[40]（622年），合浦郡改称越州。同年析合浦县部分辖地设置安昌、高城、大廉、大都四县，与合浦县同属越州。贞观六年（632年），在今营盘镇境内设珠池县，划出大都县隶属白州（今博白县）。唐贞观八年（634年），越州改称廉州。贞观十二年（638年），撤安昌、珠池二县并归合浦县。天宝元年（724年），廉州改称合浦郡。乾元元年（758年），复称廉州，辖合浦、封山、蔡龙、大廉四县，驻地在合浦县城。《太平寰宇记》载：

唐武德五年置越州，领合浦、安昌、高城、大廉、大都五县。贞观六年置珠池县，其年割大都属白州，八年改越州为廉州，十年废姜州，以封山、东罗、蔡龙三县来属，十二年，废安昌、珠池二县入合浦，废高城入蔡龙。天宝元年改为合浦郡。乾元元年复为廉州。^[41]

《新唐书·地理志》对这一时期合浦的建置记载更为详细：

廉州合浦郡，下。本合州，武德四年曰越州，贞观八年更名，以本大廉涧地。土贡：银。户三千三十二，口万三千二十九。县四。合浦，中下。武德五年置安昌、高城、大廉、大都四县。贞观六年置珠池县。后以大都隶白州。十二年省珠池、安昌入焉。封山，下。武德五年置姜州，并置东罗、蔡龙二县。贞观十年州废，以封山、东罗、蔡龙来属。后省东罗。^[42]

因南朝时期战乱频繁，地方政区规划也随地方势力消长变更无常。郡的设置数量也越来越多。《宋书·志序》便言：“魏晋以来，迁徙百计，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或昨属荆、豫，今隶司、兖，朝为零、桂之士，夕为庐、九之民。去来纷扰，无暂止息，版籍为之混淆，职方所不能记。”^[43]隋在统一南方后，改州郡县制为州县制，合浦在这一时期郡县的情况也随之更迭，由最初的统县十一，变为领县四。^[44]然而经过隋末动乱后，李靖在武德四年（621年）进入岭南地区，“度岭置桂州，分道招慰……得郡凡九十六，户六十余万”^[45]。但主要涉及的是较为偏远的地区，而合浦郡之后的变动不大，仅在贞观十二年（638年）将废安昌与珠池二县并入合浦。

值得注意的是原属合浦的钦州，在这一时期得到比较明显的发展，从而带动了合

浦水路的发展。钦州在汉时本为合浦郡合浦县地；刘宋时分合浦置宋寿郡；梁武帝置安州；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改安州为钦州，取钦江为名也；大业三年（607年）改为宁越郡；武德四年（621年）平萧铣，改为州，仍为都督府；贞观元年（627年）罢都督府，仍为州。^[46]钦廉二州在汉时均为合浦地，唐虽然分为两州，但在区域之间联系密切，在隋以及唐的初期，其州刺史或太守均为宁氏家族所控制^[47]，这对合浦水路在军事上的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

而州治合浦县在隋唐时已经北迁至今浦北县泉水镇旧州村。旧州村发现有隋唐廉州故城遗址，在南朝越州故城遗址西面约5千米，文化层内散布唐宋瓷片和瓦当等遗物，与文献记载相吻合^[48]。

（一）隋唐时期合浦地区的水运交通情况

隋唐时期，特别是唐兴以来，一直以一种极为包容的文化态度对待海外的贸易与朝贡。唐朝政府对海外贸易采取了一系列开放和鼓励的政策，促成了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与繁荣。合浦依托广州贸易的繁盛，对外贸易的范围大大超过了之前任何一个朝代。当时南海、西亚以及欧洲诸国，均与中国有密切的贸易往来。在这些国家当中，往来较为频繁的有林邑、真腊、丹丹、盘盘、印度、大秦等^[49]。同时，合浦内河航运的交通状况也在大一统王朝时期得到改善，水运交通较分裂的南朝时期更为便利。庸代时，大庾岭路得到开凿，灵渠也得到维护重新开通，成为直接影响华南地区发展的大事。

1. 全国路网重整与合浦港的内外航线

《晋书·地理志》载：“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岭峽，时有五处，故曰五岭。”^[50]大庾岭便是五岭之一，横隔于江西大余和广东南雄两个盆地之间，由西向东延伸近100千米。大庾岭的开凿始于秦始皇时期，秦始皇需要对岭南地区用兵，因而开凿了大庾岭横浦道，将赣江和北江联系了起来，同时也进一步将珠江水系与长江水系连接了起来。随着广州的兴起，大庾岭道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也为合浦新增了一条重要的通往中原地区的水运交通道路。《开凿大庾岭路记》载：

开元四载冬十有一月，俾使臣左拾遗内共奉张九龄，饮冰矢怀，执艺是度，缘磴道，披灌丛，相其山谷之宣，革其坂险之故。岁已农隙，人斯子来，役匪逾时，成者不日，则已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转输以之化劳，高深为之失险。于是乎口耳贯胸之类，殊琛绝尽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宁与夫越裳白雉之时，尉佗翠鸟之献，语重九译，数上千双，若斯而已哉。^[51]

司徒尚纪、许桂灵在《合浦港在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中指出：“泮

牂‘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牂牁江广百余步，足可行船’（《史记·西南夷列传》），这既可东下番禺，也可南出北部湾，沟通海外，合浦港正在后者位置上，交通地位不可替代。直到唐张九龄重新开凿大庾岭道，五岭南北交通重心才渐渐东移，大庾岭道成为入岭南最主要交通线，但只要湘桂走廊继续发挥功能，合浦港的存在就有它的必要性和合理性。”^[52]大庾岭的开凿，改变了五岭南北交通格局，重塑了交通节点，是合浦在盛唐之时经济发展最直接的原因。

灵渠的重新开凿则恢复了合浦前往中原地区的水运交通道路。鱼孟威的《桂州重修灵渠记》载：

灵渠乃海阳山水一派也，谓之漓水焉。旧说，秦命史禄吞越峽而首凿之，汉命马援征征侧而继疏之。所用导三江，贯五岭，济师徒，引馈运……年代浸远，堤防尽坏，江流且溃，渠道遂浅。潺潺然不绝如带，以至舳舻经过，皆同鼻荡。虽篙工楫师，骈臂束立，瞪眙而已，何能为焉。惟仰索挽肩排，以图寸进。或王命急宣，军储速赴，必征十数户乃能济一艘……是则古因斯渠，以安蛮夷，今因斯渠，翻劳华夏，识者莫不痛之。^[53]

在此文中，介绍了灵渠连通漓江，并载有前代对灵渠的修建记录，即秦为征伐南越，命史禄（监御史）首凿灵渠，沟通湘漓水道，进而连接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随后东汉马援因平定征侧、征贰叛乱的需要，对灵渠水道进行了疏通。“导三江，贯五岭，济师徒，引馈运”则充分展现了在灵渠畅通之时，对于这一区域乃至整个南北水运交通的重要性。秦汉时期，灵渠水道发挥重要的军事作用，成为北方对岭南地区用兵最主要的交通通道。由此也可以看出，灵渠虽然作为南北水运交通要道，但是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乱，在马援以后鲜有疏浚，因而“堤防尽坏，江流且溃，渠道遂浅”，不禁令人感叹“古因斯渠，以安蛮夷，今因斯渠，翻劳华夏”。产生这样的古今对比，是源于灵渠的畅通或淤塞的差别。但相同的则是，在唐代以前，灵渠对于维系岭南这片多民族聚居地区稳定的重要性，无论是在秦汉还是在唐代，灵渠都是对岭南地区军事行动最重要的水运交通道路，其通往的对象直指合浦、交州。

洎乎宝历初，给事中李公渤廉车至此，备知宿弊，重为疏引，仍增旧迹，以利行舟。遂铍其堤以扼旁流，斗其门以级真注，且使溯沿不复稽涩，李公真谓亲规养民也。然当时主役吏，不能协公心。尚或杂束篠为偃，间散木为门，不历多年，又闻湮圯，于今亦三纪余焉。桂人复苦，已恨终无可柰何矣。况近岁来蛮寇犹梗，王师未罢，或宣谕旁午，晦暝不辍。或屯戍交还，星火为期。役夫牵制之劳，行者稽留之困，又积倍于李公前时。转使桂人肤革羸腊，手足胼胝，且逃且死，无所诉怨，殆十七八矣。^[54]

至唐代宝历元年（825年），给事中李公渤曾至此，对灵渠进行了维修，其“遂铍其堤以扼旁流，斗其门以级真注”，这当中提到的铍嘴以及南渠的斗门，即修建了用于拦截河水的拦河坝和陡门。^[55]铍嘴有利于平顺地分水，南北陡门则可使陡斜的水面转变为阶级状水面，把急流变缓流。^[56]但因主持疏导的官吏没有很好地按照李渤的要求监工，工程质量堪忧。鱼孟威在碑文中指出“然当时主役吏，不能协公心。尚或杂束篠为偃，间散木为门”，不久仍“湮圯”。而此时当地少数民族反抗活动仍时有发生，疏导灵渠也就日益显得重要，以致“役夫牵制之劳，行者稽留之困，又积倍于李公前时”。显然，灵渠在战时发挥着运输军需和人员的重要作用，在平时则为行旅以及商贸的主要通道，李公渤的疏导其目的显然不完全是军事的，也有“养民”的愿望。

咸通九年，余自黔南移镇于此，舫棹岭首，备观其事……因召君素：“若能主张乎？”君素唯之，遂领其事。凡用五万三千余工，费钱五百三十余万。固不敢侵征赋，必竭其府库也。不敢役穷人，必伤其和气也。皆招求美财，标求善价，以佣愿者。自九年兴工，至十年告毕，其铍堤悉用巨石堆积，延至四十里……虽百斛大舸，一夫可涉。繇是科徭顿息，来往无滞，不使复有胥怨者。^[57]

咸通九年（868年），当鱼孟威在此处重新凿通灵渠之时，高骈已平定安南叛乱。^[58]显然此时凿通灵渠固然有军事运输方面的需要，但也为商旅通过此水运交通道路提供了良好的通行条件，“虽百斛大舸，一夫可涉”说明了这条水运交通道路的运输能力得到了改善和提升。根据《桂州重修灵渠记》记载可以明显看出，朝廷对灵渠的开凿以及疏浚，其军事目的无疑是首位的，而在这之中也无法忽略其对沟通南北商旅发挥的作用，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作用，才会牵引出“役夫牵制之劳，行者稽留之困”。可见在唐代，灵渠仍然是沟通南北的重要水运交通道路。正如司徒尚纪、许桂灵所言，这条水道在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合浦港作为其向南的出海口之一，就有其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必要性。

2. 宁氏家族控制下的合浦港

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隋唐时期虽然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繁荣，但是“安史之乱”后，中原地区又逐步失去了对安南地区的绝对掌控，仍然要依靠合浦作为军事基地以及水运交通的支点，以保持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在隋朝以及唐朝前期，合浦为宁氏家族所控制，隋炀帝时期宁长真为钦州刺史，宁宣为合浦太守，家族势力建立在其军事基础之上。《新唐书》有载：

有宁氏，世为南平渠帅。陈末，以其帅猛力为宁越太守。陈亡，自以为与陈叔宝同日而生，当代为天子，乃不入朝。隋兵阻障，不能进。猛力死，子长真袭刺史。

及讨林邑，长真出兵攻其后，又率部落数千从征辽东，炀帝召为鸿胪卿，授安抚大使，遣还。^[59]

陈末，宁猛力作为宁越太守，不肯归附隋朝，虽言其“隋兵阻瘴，不能进”，但这其实也反映出隋初对于这样的地方豪强没有办法。之后其子宁长真虽归附，但朝廷仍然承认其势力，令其袭为刺史。隋炀帝时期，宁长真曾出兵助隋攻打林邑，在攻打辽东时更率部落数千人跟随隋炀帝。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合浦前往这些地区的水运交通是便利的。林邑在今越南中部，秦时是象郡地，汉置象林县，汉末脱离朝廷控制并自立，在南朝时期曾“侵暴日南、九真诸郡”。

隋末唐初，宁氏家族占据钦州、合浦等地，至武德五年（622年）才遣使降于唐。当中所言“自是交、爱数州始通”皆说明在这一时期，合浦地区仍然是通往交州最主要的通道，甚至在军事方面是唯一的通道。合浦之地始称廉州是在唐贞观八年（634年）越州改名为廉州之后。廉州之名一说是以大廉垌为名，另一说则是因孟尝“合浦珠还”的故事，希望官员廉洁而名。此处所言宁宣之子宁纯为廉州刺史应是在贞观八年（634年）以后。而此时合浦地区应称越州，因与会稽郡改称的越州相区别，故称南越州，其刺史即宁道明。但这一区域并不稳定，当中所言宁道明与冯暄、谈殿据南越州反便是明证。同时宁纯、宁长真也发兵支援，宁长真所陷的封山县便是姜州的属县。随后贞观十年（636年），姜州废，其属县封山、东罗、蔡龙皆归属廉州，这也是唐初宁氏家族势力扩大的表现。

《新唐书·南蛮列传》所记载的宁氏家族显然对合浦地区有着重大的影响，这一整段的记载说明宁氏家族在隋朝以及唐初期发挥的重要作用，朝廷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一区域的治理都是建立在承认宁氏家族的地方势力之上，以太守、刺史之位，将他们笼络进入中央王朝的管理体系之内。宁氏家族在南朝时期迁入合浦地区，廖幼华根据石刻史料整理出了宁氏家族从南朝起至隋朝以及唐初的任官情形：宁逵（梁定州刺史、陈安州刺史）、宁猛力（陈宁越太守、隋安州刺史）、宁长真（隋钦州刺史）、宁贇（隋大都督）、宁建弘（隋上仪同村司）、宁宣（隋合浦太守）、宁道明（唐南越州刺史）、宁聚（唐太宗钦州刺史）、宁纯（唐廉州刺史）、宁师京（唐钦州首领）、宁道务（唐襄州临漳县令、郁林刺史）、宁歧风（唐桂州始安县主簿）、宁歧茷（桂州荔浦县）。在唐武德朝以前宁氏子弟官职皆是地方首长，显然这是朝廷承认地方势力，以刺史职衔笼络在地方的汉人势力的一种做法。而在唐贞观以后，唐朝结束隋末以来的地方割据，开始处理岭南等沿边地区的问题，加强对汉人豪强统治下的正州县的统治，促使大族子弟官僚化，渐渐以流官取代，从而加强对这些州县的控制。^[60]《新唐书·南蛮列传》载：

又以其族人宁宣为合浦太守。隋乱，皆以地附萧铣。长真，部越兵攻丘和于交趾者也。武德初，以宁越、郁林之地降，自是交、爱数州始通。高祖授长真钦州都督。宁宣亦遣使请降，未报而卒，以其子纯为廉州刺史，族人道明为南越州刺史。六年，长真献大珠，昆州刺史沈逊、融州刺史欧阳世普、象州刺史秦元览亦献筒布，高祖以道远劳人，皆不受。道明与高州首领冯暄、谈殿据南越州反，攻姜州，宁纯以兵援之。八年，长真陷封山县，昌州刺史庞孝恭掎击暄等走之。明年，道明为州人所杀。未几，长真死，子据袭刺史。冯暄、谈殿阻兵相掠，群臣请击之，太宗不许，遣员外散骑常侍韦叔谐、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淹持节宣谕，暄等与溪洞首领皆降，南方遂定。^[61]

宁长真从合浦出发，攻打林邑，正是说明合浦承继魏晋南北朝时期，仍是联络交州的出发港。宁长真在广西北部湾的合浦，却可以率部落几千人随隋炀帝攻打辽东，合浦的沿海水运交通较前代又得到了进一步扩展。这也表明了至少到唐代为止，北起黄海辽东半岛沿岸，南至北部湾广西沿岸，都有了船舶航行的记录。^[62]

“安史之乱”后，“西原蛮”动乱，黄洞首领黄少卿独大，经常攻略邕州以及钦州。《新唐书》载：

长庆初，以容管经略使留后严公素为经略使，复上表请讨黄氏。兵部侍郎韩愈建言曰：“……南讨损伤，岭南人希，贼之所处，洞壑荒僻。假如尽杀其人，得其地，在国计不为有益。容贷羈縻，比之禽兽，来则捍御，去则不追，未有亏损朝庭。愿因改元大庆，普赦其罪，遣郎官、御史以天子意丁宁宣谕，必能喧叫听命。为选材用威信者，委以经略，处理得方，宜无侵叛事。”不纳。^[63]

长庆元年（821年），朝廷为应对黄氏的动乱，进行了讨叛和招抚的讨论。《新唐书》这段记载记述了韩愈的招抚方针，如征讨平乱，“尽杀其人，得其地，在国不为有益”，而放着不管，“来则捍御，去则不追”则有损朝廷的声誉，理应招抚，却没有得到采纳，仍然采取一种漠视的态度。

黄贼更攻邕州，陷左江镇；攻钦州，陷千金镇。……明年，又寇钦州，杀将吏。是岁，黄昌瓘遣其党陈少奇二十人归款请降，敬宗纳之。

黄氏、侬氏据州十八，经略使至，遣一人诣治所，稍不得意，辄侵掠诸州。^[64]

而后黄氏叛乱更甚，连续攻略钦州等地。朝廷不得不采取招抚的政策，却仍然“稍不得意，辄侵掠诸州”。《新唐书》这段记述充分展现了这一时期钦州、廉州是重要的军事据点和前线。

到了唐懿宗时期，南诏入侵交州导致交州沦陷，于是置行交州于海门镇，寻复置

安南督护府于此。《旧唐书·懿宗本纪》载：

咸通五年四月，南蛮寇邕管，以秦州经略使高骈率禁军五千赴邕管，会诸道之师御之。六年五月，安南高骈奏于邕管大败林邑蛮。七年十月，安南高骈奏蛮寇悉平。八年三月，高骈奏：“南至邕管，水路湍险，巨石梗途，令工人开凿讫，漕船无滞者。”降诏褒之。^[65]

这件事前文已经提到过，咸通四年（863年）南诏攻陷交趾，安南都护蔡袭溺海死，幕僚樊绰携印渡江，唐政府随即废安南都护府，“置行交州于海门镇”^[66]，至此，唐政府在南海最重要的政区的治所落户合浦。为了应付前线战事，从广州出发的运粮船，都需要沿海经过钦州及廉州，汇集到合浦。李商隐在《为蒙阳公论安南行营将士月粮状》中有记载：

使当道先准诏发遣行安南行营将士五百人，其月粮钱米并当道自般运供送者……又当管去安南三千余里，去年五月十五日发遣，八月二十日至海门遭恶风，漂溺官健一十三人，沉失器械一千五百余事……今年五月八日至乌雷又遭飓风，打损船三只，沉失米五百余石，见钱九十贯。其月十八日至昆仑滩又遭飓风，损船一只，沉失米一百五十石，至今姜士贇等尚未报到安南。^[67]

廖幼华在《唐宋时期钦廉交三州的交通与寨镇》中谈到，出发往安南的兵员、钱、米从广州出发后，沿海岸西行，先经过廉州江口海门，再经过钦州东南之乌雷暗滩，过钦州，抵达交州。《唐乾符中碑》记载了该条海路的情况：

唐咸通末，安南都护高骈既平蛮僚，诏归阙，自海路由合浦而上经是滩，峻险不可行，又中伏巨石，骈因留俸钱，遣海门防遏使杨俊营治之。至今舟楫通行，人无艰阻。乾符中，俊立碑以纪其事，碑今存焉。^[68]

这条线路与传统的合浦东海道大体吻合。同时，廖幼华特别强调，唐政府废安南，置行交州，虽是战事，但为了维持补给，也大大促进了合浦东海道这条交通线沿途的海运交通。^[69]

总体来看，唐代合浦地区从宁氏藩镇时期到海门镇行交州时期，都是西海道军事线上的重镇。

3. 采珠等地方产业促动的人口流入与港口发展

隋唐时期，特别是入唐以后，在史籍中出现了两个十分著名的关于合浦的传说，一是“合浦珠还”，一是“合浦杉叶飞入洛阳城”。这两个传说都与移民迁入有关。

“合浦珠还”的故事在史籍中有两见。其一是《汉书·孟尝传》中所载：“郡不产

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阯比境，常通商贩，留余粮食。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尝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逾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返）其业，商货流通，称为神明。”其二便是《册府元龟》中所载：广德二年五月己酉，河南府上言河阳县界黄河清，逾月不变。十一月，镇南副都护宁龄先言：“合浦县海内珠池自天宝元年以来，官吏无政，珠逃不见，二十年间，阙于进奉。今年二月十五日，珠还旧浦，臣按《南越志》云‘国步清，合浦珠生’，此实国家宝瑞。其地元敕封禁，臣请采进。”^[70]这两处记载一条是言汉孟尝在任合浦太守后，“革易前敝，求民病利”，使得合浦去珠复还，从而使得合浦的商业贸易复兴；另一条则是宁龄先言“官吏无政，珠逃不见”，而偶有的“珠还旧浦”成为“国家宝瑞”，并请采进。这都表明了合浦地区所产的珍珠长期以来用于贸易以及朝廷贡物的事实。合浦所产的珍珠是当地“常通商贩，留余粮食”的重要商品，两汉时期的合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水运交通线路发达，也让合浦珍珠更为驰名，进而官吏为求谋利，“不知纪极”，导致合浦珠去。而到了三国至隋唐时期，珍珠的采捕均受到朝廷的严格控制，合浦的商贸活动也因多种原因逐渐衰落。“合浦珠还”的故事逐渐由地方官员的德政变成国家祥瑞的表现，进一步提升了“合浦珠还”的意蕴，成为地方乃至国家政治情况的象征。

合浦所产珍珠在唐代依然是重要的贡品以及内外贸易的商品。《册府元龟》载：

十一月，镇南副都护宁龄先言：“合浦县海内珠池自天宝元年以来，官吏无政，珠逃不见，二十年间，阙于进奉。今年二月十五日，珠还旧浦，臣按《南越志》云‘国步清，合浦珠生’，此实国家宝瑞。其地元敕封禁，臣请采进。”^[71]

《新唐书》记载：

（成通四年）七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免安南户税、丁钱二岁，弛廉州珠池禁。^[72]

《旧唐书》记载：

（成通四年）七月朔，制：“廉州珠池，与人共利。近闻本道禁断，遂绝通商，宜令本州任百姓采取，不得止约。”^[73]

“合浦珠生”属于国家的祥瑞之物，为唐王朝所重视。另外，唐代与前代不同，对于合浦的采珠业从禁止到放开的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合浦的商业贸易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随着合浦水运交通道路的恢复，商人又逐渐开始在合浦活跃起来。后世《廉州府志》记载了一个关于外地人来合浦采珠的故事：

何游泰，新州人。颇读书，知大义。觉其兄游鲁有异志，即弃产资，与妻子客寓合浦，为采珠徒长。唐代宗时人。^[74]

采珠业的发展，促动了合浦人口的增长，为明珠而来的各色人等会聚于此，珍珠采捕、贡纳、贸易等各种活动红火展开。

唐代杨衡曾作诗《送王秀才往安南》：

君为蹈海客，客路谁谙悉。鲸度乍疑山，鸡鸣先见日。所嗟回棹晚，倍结离情密。无贪合浦珠，念守江陵橘。^[75]

杨衡，字中师，凤翔宝鸡（今属陕西）人。其曾为广州岭南节度使薛珣幕中从事，对岭

南的交通情况应是熟悉的。调露元年（679年），朝廷改交州都督府置安南都护府，治宋平县（今越南河内市），其诗名中所说的“安南”即今越南。“君为蹈海客”表明了王秀才前往安南是通过海路的，而“无贪合浦珠”以合浦珠为意向，表明了合浦是通往安南海路的必经之地，侧面反映了在唐代合浦既是军事行动的重要基地，也是商旅前往安南的常行道路。

关于“合浦杉叶飞入洛阳城”的最早的两种记载，分别见于《南方草木状》和《交州记》中。嵇含《南方草木状》记载：

杉，一名披黏，合浦东二百里，有杉一树。汉安帝永初五年春，叶落，随风飘入洛阳城。其叶大常杉数十倍，术士廉盛曰：“合浦东杉叶也，此休征，当出王者。”帝遣使验之，信然，乃以千人伐树，役夫多死者。其后三百人坐断株上食，过足兼容，至今犹存。^[76]

刘欣期的《交州记》今已不见其原本，多为辑录，《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皆对这段记载有所引用，文字略有出入，现录于下：

刘欣期《交州记》曰：合浦东一百里有一杉树，叶落随风入洛阳城内，汉时善相者云：“此休征，当出王者。”帝遣千人伐树，役夫多死。三百人坐株上食，适足相容。^[77]（欧阳询等《艺文类聚》卷八十九）

刘欣期《交州记》曰：合浦东二百里有一杉树，叶落随风入洛阳城内，汉时善相者云：“此休征，当出王者。”故遣千人伐树，役夫多死，三百人坐断株上食，过足相容。^[78]（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九百五十七）

《南方草木状》和《交州记》对“合浦杉叶”传说的记载基本一致。《南方草木状》在唐宋之时虽存在多个版本，但后世其他文献在引用《南方草木状》中“合浦杉叶”的相关记载时，也基本没有大的改动。而《交州记》一书，应该在明代以前散佚，大

概唐宋时还可以看到其完本。^[79]现存最早征引《交州记》的《艺文类聚》和《太平御览》在“合浦杉叶”的记载方面，有两处细微的差异：一是《艺文类聚》中为“合浦东一百里”，而《太平御览》中则为“合浦东二百里”；二是《艺文类聚》中为“三百人坐林上食，适足相容”，《太平御览》中则为“三百人坐断株上食，过足相容”。依据《南方草木状》所载，《太平御览》所引《交州记》或许更为准确。

关于“合浦杉叶飞入洛阳城”的这一条，可选用更为明确的《南方草木状》中的记载来加以分析。文中所言，汉安帝永初五年（111年），合浦杉叶比常见杉叶大数十倍，随风飞入洛阳城。当时的术士解读这一异象，认为是“休征，当出王者”。这种关于异象和解读异象的记载，应是从西汉中晚期开始流行的讖纬之风的延续。汉代讖纬受到思想界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的影响，对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历史上的众多统治者也曾利用甚至制造讖纬来达到争权夺利的政治目的。而汉代的众多儒学士往往既习经学又研讖纬之学，如东汉韩说“博通五经，尤善图纬之学”^[80]。李零认为，与官方关系密切的方士儒生，既明经艺，又通方术，驰骋穿凿，迎合帝王，带有较多的官方色彩。特别是哀帝、平帝之后，图讖蔚兴，王莽矫用符命，光武尤信讖言，对儒者的方士化更是推波助澜。^[81]“合浦杉叶”条中所载的术士应即是汉代方士化的儒生。

术士解读合浦杉叶这一异象，认为乃是“休征，当出王者”。《汉书》有载：“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显功，以自尊世。观其文辞，方外百蛮，亡思不服，休征嘉应，颂声并作。至乎变异见于上，民怨于下，莽亦不能文也。”颜师古在此注为“休，美也；征，证也”^[82]。“合浦杉叶”这种象征着出王者的吉兆，对于汉王朝的统治者来说却是一种威胁。东汉乃至魏晋时期的异象，以讖纬的方式解读出来，经常带有政治意味，而讖纬其实也是对现实社会状况的反映。“合浦杉叶”象征出王者的征兆，恰恰与汉代合浦地区少数民族多次叛乱的事实正相符合。“合浦杉叶”条所言，汉安帝遣人验证杉叶一事，并派人前去伐树。汉安帝遣人伐树之举的这条记载，显然反映了中原王朝对合浦地区时常反叛的担忧。^[83]

此后，“合浦杉叶飞入洛阳城”的记载，特别是在魏晋以后，其意味发生了转变。南朝时期的江总曾作《遇长安使寄裴尚书》，前两句便是：“传闻合浦叶，远向洛阳飞。北风尚嘶马，南冠独不归。”江总，字总持，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人，侯景之乱后流寓岭南，通过这首诗表达对中原的思念。唐代张说也有诗《南中送北使二首（其一）》云：“传闻合浦叶，曾向洛阳飞。”^[84]张说，一字道济，一字说之，洛阳（今属河南）人。武后时举贤良方正第一，授太子校书，累官至凤阁舍人。因不阿附张易之兄弟，配流钦州。这些诗都说明“合浦杉叶飞入洛阳城”的意向，逐渐从对地方反抗中央的担心变成了流落合浦的中原士人诗中的典故，以表达对中原的思念和忠诚。

无论是“合浦珠还”还是“合浦杉叶飞向洛阳城”，大背景都是外来人口与文化的流入。合浦自汉置郡之后，一直是中原王朝或者南方政权稳定的军事基地，到盛唐之时，更多北方士人、商客、工匠自北方乘舟而来，合浦与中原的连接也愈发紧密。正是有这样的环境，才会有这样的故事。

总的来看，中古时期的合浦虽不似秦汉时那般一枝独秀、繁华鼎盛，但也还是保持着南方大港的气派，水道通畅，贸易八方。

- [1] 黄启臣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中，通过对这一时期正史的检查，发现东南亚诸国朝贡贸易的次数多达 101 次，由此反映了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较前代有了很大发展。参见黄启臣：《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 年，第 89 页。
- [2] 张嫦艳、颜浩：《魏晋南北朝的海上丝绸之路及对外贸易的发展》，《沧桑》2008 年第 5 期，第 19-21 页。
- [3] 廖国一：《南流江变迁与合浦港的兴衰》，载吴传钧主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79 页。
- [4] [西晋]陈寿撰，[南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四九《吴书·刘繇太史慈士燮传第四》，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第 1189 页。后世《合浦县志》所载更认为，士燮以及士壹治交趾合浦超过 40 年无战乱。
- [5] 赵德馨主编，何德章著《中国经济通史（第三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70-84 页。
- [6]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465 页。
- [7] [西晋]陈寿撰，[南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四七《吴书二》，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第 1134 页。
- [8]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年，第 100 页。
- [9] 同[7]，卷三九《蜀书九》，第 723 页。
- [10] [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三八《州郡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197 页。
- [11] [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一四《志第六州郡上》，北京：中华书局，1972 年，第 267 页。
- [12] 见《太平御览》所记“陈伯绍平夷至合浦，见三青牛，围而不获”。
- [13] 《（道光）廉州府志》卷一八《宦绩志》，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廉州府部》（三），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 年。
- [14] 邹逸麟：《古代合浦史地杂谈》，载吴传钧主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20 页。
- [15] 黄立廉在《越州史考》中认为，越州的出现正是表现为交州与广州之间的矛盾。见黄立廉：《越州史考》，《广西地方志》2007 年第 2 期，第 46-47 页。
- [16] [北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舟部》卷七六九，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 3410 页。
- [17] 同[16]，卷七七一，第 3419 页。
- [18] 李富强：《西南便捷出海通道的时空变迁》，载吴传钧主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239 页。
- [19] [北魏]杨衒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第 236 页。
- [20] 《法显传》中记载：“商人议言：常行时正，可五十日便到广州。”参见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 171 页。
- [21] 陈洪波：《浅析三国之后合浦港衰落的原因》，《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 年第 3 期，第 72-76 页。
- [22]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五七，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560-1561 页。
- [23] 邹逸麟：《古代合浦史地杂谈》，载吴传钧主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20 页。
- [24] 赵德馨主编，何德章著《中国经济通史（第三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141 页。
- [25] 张荣芳、周永卫：《汉代徐闻与海上交通》，《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3 期，第 1-8 页。
- [26] 张金莲：《六世纪前的交趾与内地交通》，《学术探索》2005 年第 1 期，第 109-114 页。
- [27] [西晋]陈寿撰，[南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四九《士燮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第 1193 页。
- [28] [西晋]陈寿撰，[南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四八《孙皓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第 1167 页。
- [29] 同[28]。
- [30]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五七《陶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558 页。
- [31]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四《南中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 年，第 465 页。

[32] 同[30], 卷一〇〇《卢循传》, 第2636页。

[33] 姚思廉:《陈书》卷八《杜僧明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年, 第135页。

[34] 同[28], 第1172-1173页。

[35] 廖幼华:《秦唐之间汉人在广西的发展》, 载徐杰舜、周建新编《人类学与当代中国社会——人类学高级论坛2002卷》,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年, 第370-371页。

[36] 廖国一:《南流江变迁与合浦港的兴衰》, 载吴传钧主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年, 第179页。

[37] [西晋]陈寿撰, [南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四九《吴书·刘繇太史慈士燮传第四》,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年, 第1189页。后世《合浦县志》所载更认为, 士燮以及士壹治交趾合浦超过40年无战乱。

[38] 同[35], 第372-373页。

[39] [唐]杜佑:《通典》卷一八四《州郡十四》, 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等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年, 第4951-4953页。

[40] 《輿地广记》《新唐书·地理志》称越州为武德四年(621年)所置, 但是据《元和郡县志》《旧唐书》记载, 合浦郡应在武德五年(622年)改称越州。《輿地广记》则称:“廉州。古百越之地, 秦属象郡, 汉合浦郡。东汉因之, 吴改曰珠官郡, 晋复曰合浦。宋分立临漳郡, 兼立越州。齐、梁、陈因之。隋平陈, 郡废。大业初, 改州曰禄州, 寻改为合州, 又废, 而立合浦郡。唐武德四年立越州。贞观八年改名, 天宝元年曰合浦郡。”《新唐书》中记载“合浦郡的各县建置也在武德五年”。《册府元龟》中记载“武德五年, 合浦太守宁宣才遣使来降”, 可见越州的设置必然是在此之后。此书言“武德四年曰越州”, 或许与“武德四年改会稽郡为越州”相混淆。参见[北宋]欧阳忞:《宋本輿地广记》卷三七《广南西路下》, 士礼居丛书景宋本, 第241页。

[41] [北宋]乐史编《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九《岭南道十三》, 王文楚等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年, 第3228页。

[42] [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年, 第1095页。

[43] [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一一《律志序》,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年, 第204页。

[44] 具体废置情况参见[唐]魏徵、令狐德棻:《隋书》卷三一《志第二十六·地理下》,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年, 第884页。

[45] 同[42], 卷九三《李靖列传》, 第3812页。

[46] [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八《岭南道五》,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年, 第954页。

[47] [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列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年, 第6326页。

[48] 陆露、张居英:《西汉合浦港口考辨》, 《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 第172-178页。

[49] 曹家齐:《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 香港: 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年, 第144页。

[50]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一五《地理志》,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年, 第464页。

[51]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二九一, 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记》,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年, 第2950页。

[52] 司徒尚纪、许桂灵:《合浦港在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载吴传钧主编《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年, 第53页。

[53]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八〇四, 鱼孟威《桂州重修灵渠记》,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年, 第8453-8454页。

[54]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八〇四, 鱼孟威《桂州重修灵渠记》,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年, 第8453-8454页。

[55] 范玉春:《灵渠的开凿与修缮》, 《广西地方志》2009年第6期, 第49-51页。

[56] 郑连第:《灵渠工程及其演进》, 《广西水利水电科技》1985年第3期, 第10-29页。

[57] 同[54]。

[58] 高骈平定交州、钦州一带叛乱在成通七年(866年), 见上引《旧唐书·懿宗本纪》。

- [59] [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326页。
- [60] 廖幼华：《秦唐之间汉人在广西的发展》，载徐杰舜、周建新编《人类学与当代中国社会——人类学高级论坛2002卷》，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86-388页。
- [61] [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326页。
- [62] 曹家齐：《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第124页。
- [63] [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332页。
- [64] 同[63]，第6331-6332页。
- [65]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懿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60页。
- [66] [北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五〇“懿宗成通四年六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105页。
- [67]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七二，李商隐《为荥阳公论安南行营将士月粮状》，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052页。
- [68] 马蓉、陈抗、钟文等点校《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第一册《郡县志·梧州府》，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4页，另见录于后世多种典籍，如[清]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一六〇《唐乾符中碑》、[清]汪森编《粤西丛载》卷一《唐乾符中碑》等。
- [69] 廖幼华：《唐宋时期钦廉交三州的交通与寨镇》，载郭声波、吴宏岐主编《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第四辑)·南方开发与中外交通》，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7年，第342页。
- [70] [北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二五，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248页。
- [71] 同[70]。
- [72] [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九《懿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8页。
- [73]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上《懿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54页。
- [74] [明]张国经修，郑抱素纂《（崇祯）廉州府志》卷九《名宦志》，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廉州府部》（一），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148页。
- [75] [北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二七六杨衡《送王秀才往安南》，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1396页。另见录于后世多种典籍，如[明]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卷六四杨衡《送王秀才往安南》、[清]康熙圣祖仁皇帝《御定全唐诗》卷四六四杨衡《送王秀才往安南》等。与《石仓历代诗选》（四库本）、《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记载无异。
- [76] [西晋]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55年，第9页。
- [77] [唐]欧阳询等：《艺文类聚》卷八九《木部中》，汪绍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547页。
- [78] [北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九五七《木部六》，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第5652页。
- [79] 杨恒平：《关于刘欣期〈交州记〉辑佚的几个问题》，《中国地方志》2016年第1期，第47-52页。
- [80] [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八二下《方术列传第七十二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733页。
- [81] 李零：《战国秦汉方士流派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2期，第34-48页。
- [82] [东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一二《平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1页。
- [83] 向群、万毅、林英：《历代文献中的合浦汉唐资料汇编》代序论，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第7-9页。
- [84] [唐]张说撰，熊飞校注《张说集校注》卷六《南中送北使二首（其一）》，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91页。另见录于后世多种典籍，如[北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二九六，[唐]张说《南中送北使二首（其一）》；[明]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卷二七，[唐]张说《南中送北使二首（其一）》；[清]康熙圣祖仁皇帝《御定全唐诗》卷八八，[唐]张说《南中送北使二首（其一）》等。